

色頭史料薈要

第十二輯



色頸史料薈要

第十二辑



封面装帧：兆 平

包头史料荟萃第十二辑

经内蒙古出版局批准限额内部发行

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
编辑者 包 头 市 档 案 馆
印 刷 内 蒙 古 教 育 印 刷 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48,720 1984年12月印

包头史料荟要

第十二期目录

中共绥远特委建立的经过	王德恭 苗占公 (1)
绥远特委是否曾改为绥远省委	苗占公 王德恭 (6)
绥远特委在包头建立时间考析	苗占公 王德恭 (8)
包头县委地下活动纪实	郭世乐 苏文整理 (13)

回忆包头《西北民报》	杨令德 (18)
------------	----------

〔人物志〕

斯坦纳系列的征服者——陆宰羲	(22)
----------------	------

包头疆域建置沿革	李六生 (33)
----------	----------

包头城市规划初期情况简介

市城乡建设局 唐克家	(77)
包头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概况(下)	李茂荣 (86)
包头市自来水建设概述	黄子生 (105)

固阳县资源概述	包头市农牧业区划办公室 (115)
---------	-------------------

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约、借约中

所看到的问题	金启琮 (135)
--------	-----------

包头金融志(上)	包头市人民银行 马仁执笔 (157)
----------	--------------------

西北回民起义与包头	金 申 (195)
-----------	-----------

著名餐馆义和楼	荣桐如 (200)
---------	-----------

旧《萨拉齐县志》简介……………王德恭 (203)

美岱召泰和门石刻题记 证误……………王德恭 (205)

美岱召城门石匾再考 释……………金 中 (208)

游访包头杂记丛钞 (十二)

《西游日记·沿途杂录》……………徐旭生 (215)

〔补充·订正·质疑〕

有关民生渠的一些补充…………… (217)

编辑说明…………… (220)

本辑照片摄影：王满成、李曙光、冯式坤、张建生、

王鹏成

本 辑 绘 图：李六生

中共绥远特委建立的经过

王德恭 苗占公

中共绥远特委是1933年8月初在包头成立的。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呢？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将吞并中国做为它的国策，于1931年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我们东北，1933年3月4日又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继而进攻长城各口，企图蚕食鲸吞华北。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策略，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军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形势变化，仍然认为国民党内好似铁板一块，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继续强调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由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执行，结果使1933年白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红区虽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也遭受了很大损失。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一个机关，两个牌子）虽然也遭受了破坏，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这时，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正在包头地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吉合同志，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去该部找党的组织。到张家口后，吉合同志见到了中共察哈尔前线委员会书记柯庆施同志，并于7月1日写了题为《内蒙古平民革命党同志向前书写给河北省委的报告书》^①，向察哈尔前线委员会汇报了工作，并得到了指示。

吉合是河南鄆城县田嘴村人，原名田德修，化名张其胜。1905年生。1920——1925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1925——1931年在苏联留学。1927年11月，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9月，他和王若飞、潘恩普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建立中共西北特委，任军事部长。1931年11月21日，王若飞同志被捕后，吉合在土默川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②。1933年，他在包头“已将内蒙古平民革命党成立，现有同志150人”^③。

包头还有一支由蒙古族组成的地方武装——“老一团”。这支队伍在乌兰夫、吉雅泰、奎璧、李森、贾力更等蒙古族共产党员影响下，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而对我党的地下工作则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支持。在全国各地党组织屡遭敌人破坏的情况下，吉合、普涌泉等同志所以能够在包头长期坚持活动，是与这支队伍的支持和掩护分不开的。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革命形势恶化，有好长时间吉合等同志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关

系，因此，吉合同志在报告中要求河北省委派来党的负责同志。

在临河地区，以王森为书记的中共临河县委，在河套地区坚持地下斗争已长达一年半之久。临河县委在城镇、学校、乡村和国民党阎锡山的屯垦军中，建立了许多基层党组织和“穷人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积蓄了一定的革命力量。他们 also 要求在绥西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了搞垮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通过何应钦对四十一军孙殿英部采取军事压迫、政治拉拢和金钱收买的办法，并于1933年6月27日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许给四十万元开拔费，限令7月底全部撤离沙城地区。中共察哈尔前线委员会在得知四十一军调防的消息后，根据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的指示，决定派遣刘仁（化名王崇义）随孙殿英四十一军西行。刘仁于7月下旬随孙军到达包头。

刘仁是四川省酉阳县人，1909年生。1925年在北京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入党。1928—1930年在上海和天津做地下党的工作，1930年8月被捕入狱。1932年12月，他从天津出狱后，到张家口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前线委员会工作④，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来包时年仅二十四岁。

刘仁来到包头，首先与乌兰夫同志接了头。

当时，吉合住在包头园子巷蒙古族房东李二全家里，得知孙殿英部到了包头，正考虑和四十一军中的我党组织取得联系，乌兰夫、白海峰等人找上门来了。

乌兰夫把吉合领到他的一位亲戚家里，见到了刘仁，接上了关系。他们二人由乌兰夫安排到“老一团”常排长家暂

时住下，刘仁向吉合宣布了中央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关于在包头建立中共绥远省特别委员会刘仁任特委书记，吉合同志任特委组织部长的决定。

刘仁和吉合在常排长家住了几天后，又由李森安排搬到了蒙古族青年恒升家里。这时，刘仁打扮成一普通小商人；吉合留着又密又长的胡子，仍然背着一个药箱子行医卖药。二人以叔侄关系作掩护，开展了工作。他们深入到部队、学校、铁路和农村，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不长的时间就熟悉了好些人，打开了工作局面。

9月中旬，刘仁赴北平汇报工作，主管秘书工作的李华生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根据指示，刘仁同志与梁一鸣同志接上了头。

梁一鸣同志是湖南省安化县人，幼年父母双亡，过流浪行乞生活，后被北平香山慈幼院收容。参加革命后，他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来包前在张家口抗日御侮救亡会筹备处工作，以后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领导的五师任职。他接到了上级通知返回北平后，方知党组织决定调他到包头，任中共绥远特委宣传部长。

1933年11月中旬，梁一鸣随刘仁来到包头，化名于岳山，安排在包头土默特小学任教师，分工负责铁路工人运动。吉合负责农运工作，重点是蒙古族聚居的农村，刘仁负责全面工作。

1934年3月，上级又派鲁奔、安建平夫妇两人来到包头。鲁奔化名小王，主要负责青年团工作，曾到石拐煤矿做工运工作。安建平担任特委秘书，负责日常工作，公开身份是刘仁的“夫人”⑤。特委还从临河县委调来陈高锁同志，担

任交通员。

这时，中共绥远特委的组织机构健全了。特委的同志们平时分散活动，每月在东门大街十二号院开一次秘密会议，研究工作。特委的工作情况，每月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一次。

综上所述，中共绥远特委的建立，正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我党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刻。我党充分利用绥远复杂而又有利的政治环境，在西北重镇包头组织和聚集革命力量，开展地下斗争前后达两年之久。特委的同志们抓住四十一军在包头停留的机会，开展了兵运工作；以包头火车站为中心，发动、组织和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斗争；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此外还开展了民族工作、农运工作和抗日反蒋等一系列革命活动。特委的同志们历尽艰辛，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唤起绥远地区的蒙汉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这是难能可贵，十分不易的。当然，工作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不善于也不注意进行长期隐蔽的斗争，在群众中，根子扎得不深，以致最终导致失败，但特委同志们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 释】

①③抄自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印件。

②见《土默特史料》第十三集“吉合”。

④见中央组织部干部档案“刘仁正本”。

⑤梁一鸣同志忆述。

绥远特委是否曾改为绥远省委

苗占公 王德恭

一九三三年八月初到一九三五年夏，在包头建立的以刘仁同志为书记的中共绥远特委，负责领导和开辟绥远的工作。这期间，中共绥远特委是否曾改为绥远省委呢？我们先将几名同志和有关史料上提出改为“省委”的原文摘录于后：

吉合同志在《我和刘仁同志在包头的一段经历》中说：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中共绥远特委改为绥远省委。”①

梁一鸣同志的《在御侮救亡的京包线上》也说：“绥远特委（后改省委）”②。

《土默特革命史编年》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间，中共绥远特委改为绥远省委（书记刘仁），直接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驻天津）。”③

乔玲同志在《星星之火》中说：“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间，接到上级指示：将中共绥远省特委改称为绥远省委，直接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④。

《一八四〇年以后》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设有绥远特委，后改为绥远省省委，负责人是刘仁同志。”⑤

上述引文中，特别是吉合同志和梁一鸣同志，系当时的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因此，容易使人们把中

中共绥远特委曾改为绥远省委当成定论。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一九三四年四月份以后的有关绥远特委的原始档案材料：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在《绥远给北方代表最近工作报告》中，多处出现“特委”字样，结尾署名是“绥远特委”。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绥远特委工作报告》和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绥远特委的报告》以及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绥远特委信》等文件的标题，都清楚地写着“绥远特委”。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绥远工作报告》是我们至今看到的有关绥远特委的最后一份文件，文中仍然讲的是“特委”，而从未涉及到特委改省委的问题。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孔原同志在《谈三三年绥远特委的有关问题》中说：“我的印象中，绥远特委没有改为省委”。

从以上档案材料和当时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的回忆看，中共绥远特委不存在改绥远省委的问题。

【注 释】

①、④《包头史料荟要》第六辑。

②、《塞原星火》第一集（下）。

③《土默特史料》第八集。

⑥包头市文物管理所编《包头文物资料》。

绥远特委在包头建立时间考析

苗占公 王德恭

关于中共绥远特委一九三三年在包头建立的具体时间，从几位老同志的回忆中，有如下几种说法：

吉合同志忆述的《我和刘仁同志在包头的一段经历》①中说：“一九三三年八、九月间”，“他（刘仁）是随着去青海屯垦的孙殿英四十一军到包头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包头建立绥远特委，刘仁同志来此任中共绥远特委书记，并宣布我任特委组织部长。”

吉合同志在另一篇回忆录《永恒的记 忆》②中又说：“九、十月间，同盟军失败了。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开到了绥远一带。就在这时，刘仁同志（化名王崇义）也受前敌委员会指派，随四十一军来绥远建立绥远特委”。

梁一鸣同志忆述的《在御侮救亡的京包线上》③说：“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旬，我随刘仁同志一起从北平又来到了包头。根据北方局关于建立绥远特委的决定，刘仁同志任特委书记，吉合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

曾领导过中共绥远特委的原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的《关于绥远党的报告》④中说：“五月又继前委派王崇义去包头创建与开辟工作”。

把上述几位同志提到的绥远特委建立时间归结起来，即

“五月”、“八、九月”、“九、十月”和“十一月上旬”四种。哪一种时间比较接近实际呢？下面依据有关史料、档案材料作些分析：

关于“五月”说，孔原同志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谈三三年绥远特委的有关问题》⑤中有这样一段解释：

“派王崇义（即刘仁）同志去绥远的两个时间（一九三三年五月和八月）可能都对。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代表决定派王崇义到绥远，由于张家口事变发生，可能改调他去了前委，然后到八月张家口事件失败，很可能由前委派他去绥远。还有可能是先去绥远，后又去张家口，再去绥远。”

孔原同志的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正确呢？

吉合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写的《内蒙古平民革命党同志向前书写给河北省委的报告书》⑥说：“关于我个人也有两点意见：①，派来党的负责同志，使我专门担负此处的军事工作，这也是在目下就有必要的。②，关于我个人的党籍问题，我由苏联加入共青团，还经常负过团的负责工作，但是没有能够入党。在一九三三年经王××（王若飞）同志个人允许我是一个中共党员，后来与党又没发生关系，所以对于我的党籍问题，没有正式解决。……所以请正式允许我作为中共的一个正式党员，才合乎我的希望，才合乎组织上的事宜”。

从这件档案材料中我们看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吉合同志写这份报告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他请求省委批准他为正式党员。吉合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才能决定他为中共绥远特委的组织部长。

由此说明，刘仁同志不可能在七月以前到包头。孔原同

志说的后一种可能，五月“先去绥远”是不存在的。

再看绥远特委书记刘仁同志的两份档案材料：

刘仁同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关于开辟绥远工作情形报告》⑦一开头就说：“八月中经前委决定派我去绥远工作。”

刘仁同志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填写的“人事登记表”⑧也写着，“一九三三年八月被派到绥远工作。”

从以上几件档案材料看，中共绥远特委建立的时间应该是八月份。

既然刘仁同志“是随着去青海屯垦的孙殿英四十一军到包头的。”那么，查证出四十一军到包头的时间，便可作出判断了。

据《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⑨第十九辑记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孙殿英留驻柴沟堡部队是日全部开抵包头”。这就说明，刘仁同志到包头的时间应该是七月下旬。

刘仁同志到包头后，先与乌兰夫等同志接头，又找到吉合同志，宣布了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关于建立绥远特委的决定。这样，中共绥远特委在包头建立的时间以八月初为宜。

至于刘仁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八月中”之说，看来也不准确。理由有三：

第一，刘仁同志《关于开辟绥远工作情形报告》是在绥远特委成立四个月之后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报告中说：“我已来平两月了”，“来平后本已写好了详细报告，因北平同志被捕遗失，这个报告是临时补写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没有原始记录，吉合同志又不在身

边的情况下，仅凭记忆补写这份报告，刘仁同志可能没有记确实绥远特委建立的具体日子，才在报告中写成“八月中”。

第二，刘仁同志在这一报告中汇报了包头铁路工作：

“八月廿九日全段工人到包头包围站长，要求答复条件八条：……。这次斗争中完全在党领导下，当时成立了反对包工头委员会，并组织起十二人的纠察队，并发了些宣传品，因装油印机只发有三、四百份，标语则贴满车站、火车及各段各站。此外，斗争胜利后召开庆祝会”。如果绥远特委建立的时间是八月中，在十几天以后的八月二十九日就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如此规模的铁路工人斗争是不可能的。

第三，根据吉合同志忆述，“得知孙殿英四十一军到了包头，正考虑怎样和孙殿英四十一军中的我党组织取得联系。那天上午……，乌兰夫同志对我说：‘老张^⑩，东面来人啦’！”^⑪吉合同志在得知四十一军到包头的“那天上午”就经乌兰夫同志与刘仁同志接上了头。孙殿英数万大部队开到包头，震动很大，搞地下工作的吉合同志一定会很快得到消息。这个时间应该是刘仁同志随四十一军于七月下旬到达包头的几天之内。刘仁同志与吉合同志接头后，宣布了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关于建立绥远特委的决定，并宣布吉合同志为特委组织部长，这时，中共绥远特委就在包头诞生了。这个时间当在八月初。

关于吉合同志的“八、九月”说和“九、十月”说，我们认为，这是他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七十七岁患心脏病住院时”忆述的，又没有查原始档案材料来佐证，显然是记不准确了，只能回忆出“八、九月”或“九、十月”这个大概时间。当然，其中的“八、九月”是接近准确的。

梁一鸣同志的“十一月上旬”之说，是否恰当？我们根据材料再来分析：

梁一鸣同志在《在御侮救亡的京包线上》写道：“……当我们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打垮了敌人的包围，占领了小汤山之后，又接到通知，让我返回北平。在北平，来找我的竟又是王崇义（刘仁）同志”。

刘仁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报告中说：“我已来平两月了”，“我现在准备明天回包头”。

从刘仁同志的报告和梁一鸣同志的回忆来看，刘仁同志在北平去找梁一鸣同志的时间是十一月。梁一鸣同志随刘仁同志到包头的的时间是在刘仁同志十四日的报告以后——十一月中旬。

吉合同志忆述的《我和刘仁同志在包头的一段经历》中说：“开初特委就我们两个人（刘仁和吉合）”。这说明，中共绥远特委在八月初建立时，梁一鸣同志还没有到包头，特委只有书记刘仁和组织部长吉合。十一月中旬，梁一鸣同志到包头参加绥远特委工作，刘仁宣布他为特委宣传部长，只能说中共绥远特委的机构比较健全了。

但是，不能把梁一鸣同志去包头的的时间定为中共绥远特委建立的时间。

中共绥远特委在包头建立的时间应是1933年8月初。

【注 释】

①见《包头史料荟要》第六辑。

②见《土默特史料》第五集。

（下转21页）